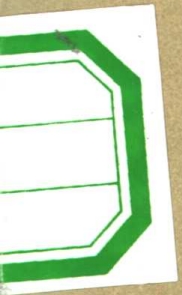


古爲今用及其他

張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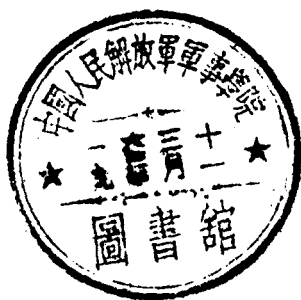




2 037 5522 1

古为今用及其他

張 真 著



中 国 ·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古为今用及其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门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632 字数 100,000 印张 $5\frac{3}{4}$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 2

1963年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定价 (4) 0.49 元

目 次

古为今用及其他.....	1
論历史的具体性.....	18
关于孙刘联盟.....	36
从政治标准看三个戏.....	44
談《十五貫》的三个人物.....	74
再談周忱.....	82
从《竇娥冤》看关汉卿剧作的政治感情.....	86
讀关汉卿《竇娥冤》第三折.....	93
論戏曲中的正面人物.....	100
从真人真事提高到典型.....	130
神話剧两題.....	136
曹操——从生活素材到艺术形象.....	144
漫談話剧学习戏剧傳統問題.....	161
让戏曲的品种流派更加繁荣起来.....	173
后記.....	180

古为今用及其他

——与一位剧作者谈历史剧的一封信

××同志：

那天在无轨电车上匆匆谈了三四站路，没有畅所欲言。前天接到了你的长信，信里谈了许多创作上的甘苦，许多只有作家才会在创作的阵痛中亲切体会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些于你是熟悉的、切身的問題，讀来对我也很有启发。比如你谈到眼高手低，或者叫做力不从心的問題，对你來說总是感到形象思維常常赶不上抽象思維，我就认为談得很好。我們对形象的刻划追求他的生动性、鮮明性，以及他在整个戏中間行动邏輯上的一致性，換言之，我們尊重他性格上的完整。这当然是应当的。并且不可否认，作为英雄人物，我們还希望在舞台上看到他那么受观众的崇敬，甚至我們自己在写他时也禁不住要十分感动。但是有时候，这种形象上的創造与預定的主题的要求，口径不大对得准，这就发生了使人煩惱的問題。形象創造得好，就会由于“形象大于思維”，产生甚至比主题所要求的更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当作家駕馭不住

人物，人物反而把作家拖到一条岔路上去，那就不免伤脑筋了。这一些問題我有时也接触一下，但想的不深，沒有你讲的这么完整和具体。讀到信使我学习到好些东西。你信上还談到你正在筹思的历史剧《臥薪尝胆》，談到艺术安排上某些举棋不定之处，此外并提到古为今用的問題、历史唯物主义的問題等等，你談的都很好，使我讀来也很感到兴趣。并且象你一样也就这几个問題思索起来，想的当然很淺，也不成熟，不妨在这里同你摆一摆龙門陣。

写历史題材首先接触到的問題，正如你說的，是“古为今用”的問題。這個問題，往往是我們构思剧本的出发点，先解决了這個問題，然后我們安排情节和处理人物才有所依据，为什么要写这个題材而不写那个題材呢？通过这个戏，作者企图給与观众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写历史題材，并不是为了表现历史生活而表现历史生活，是为了用它来教育今天的群众，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于今天的人民，今天的斗争有益。我国的历史悠久，从奴隶社会，到漫长的封建社会，都有許多資料留傳下来，供后人的研究和采擇。但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知識，历史經驗和教訓，對我們都有同样大的教育意义，不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历史上的故事編成戏，这就需要選擇。我們今天需要以勤儉建国，自力更生的精神，来鼓舞群众的斗志，为此你選擇了越王勾踐的事迹来写你的戏，这当然是十分有意义的。

勾踐的发憤图强,与我們今天的勤儉建国意义当然不同,他的事业与我們今天的人民事业,自然也不能相比,但他大敗以后,毫不灰心,臥薪尝胆,立意复兴越国的壮志,难道不是很可感动人的嗎?他的坚忍不拔和刻苦自励的作风,不是对我們也可以有激励的作用,使我們想勾踐尚且如此,而況我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嗎?这样的历史题材,有助于鼓舞我們的士气,不用說是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的。它告訴人們,應該奋发有为而不是苟安旦夕,應該艰苦斗争而不是貪图安逸,一个个人,一个国家,都是應該这样。應該依賴自力更生,而不是去等待或埋怨什么客观条件。試看勾踐被吳夫差所敗,君臣为虏,国将不国,那条件要算是十分恶劣的,但是他們君臣奋起,励精图治,依賴自己的力量,終于轉弱为强了。我想,古来发憤图强,从来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合于辯证法的規律的。事物发展,只能是以內因为根据,外因只起条件的作用,它还是要通过內因来推动事物的发展。沒有自力更生的意願,有良好的客观条件也不一定能够强大起来。夫差在胜越之后,国力强大,敌国屈服,客观条件不是很好的嗎?但他腐化墮落,这些优良的客观条件,反而助长他的驕气,助长他的“政治衰退”。他的終于失敗,也可以說是他自己的內因起作用的。倘夫差于胜利之后,仍然尽心国政,不奢不腐,越国的“捐貨币以惑其君臣,遺美女以惑其心志”,又有什么用呢?古时詩人,把

吳的失敗，歸咎西施，老實說，在那時的一個宮庭侍妾，怎么可能掌握國家的命運呢？魯迅先生就反對過這樣的觀點。古人說：“木必先腐而后蟲生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真是很值得深思的話。

古來國家的盛衰興亡，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迹，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些歷史上的事情發生、發展、滅亡和復興的過程，古來一些大政治家、軍事家怎樣從失敗的教訓中，揣摩事物發展的規律，因勢利導，而濟之以主動能力，使國家臻于富強，這些歷史經驗就增進了今天我們對歷史辯證法的了解，有助於我們在今天的鬥爭中掌握自己的命運和推進今天的歷史。古為今用，我以為這就是其“用”。這樣談，仿佛這個“用”太間接了，然而發生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那個階級的事情，事實是難于直接用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這個階級的事業上的。馬列主義猶且不能硬搬，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可見，談到歷史經驗，今為今用也是不能簡單地照抄和直接搬用，何況古為今用呢？人們讀了歷史，常常可以有所悟，這個悟就表現了歷史真理對我們的啟示作用。

古為今用，很大部分指的是這種題材內容的選擇。如果說，我們在抗日游擊戰爭的年代選擇了“三打祝家莊”的題材，反蔣的年代選擇了一系列的農民起義的題材，那麼，在今天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時期，選擇古來一

些政治家的刻苦努力、建設國家的題材，我以為都是正確地考慮到古為今用。但正確地選好題材以後，在寫作時卻應該很好地按照歷史的真實情況，通過概括和提煉的藝術化過程，來描寫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使古人帶有古人的特徵，古事帶有古事的特徵，表現出“歷史的具體性”。我們有時是愛把今天人的思想增加于古人的。“人們總是很容易把我們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變了古人。”（黑格爾：《哲學史演講錄》，第一卷，第一——二頁）這樣做其實無助於提高作品的思想，反而使古人的形象得不到正確的表現。我以為古為今用，決不是依靠歪曲當時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實面貌，以求與今天相似。作者當然完全可以去強調或細寫歷史事件的有意義的部分而比較簡略交待其他部分，但是還是要力求寫得準確，寫得有歷史的真實感。如果說，演員應該“裝龍象龍，裝虎象虎”，那麼作者的手也應該“寫今象今，寫古象古”。我們應該把歷史的教育性和歷史的真實性，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下結合起來。從藝術上來看，不只要要求符合於歷史的基本真實，也還要要求有細節的真實。恩格斯在給哈格納斯的信上說：“除了細節的真實之外，還要寫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可見，細節的真實也是十分必要的。一個作品寫得真實、有說服力，不只是使作品的藝術方面加強了，而且也使作品的政治方面加強了。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以為寫歷史劇最好避免採取影

射的手法，尽管这手法对作者有多么大的诱惑性。影射往往只是把作品的思想意义建筑在古今的表面相似上面，这样会有着剧场的戏剧效果，而经不得深入的推敲。例如把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说成“抗秦援赵”，就使人于将今比古之后，不免发生迷惑。况且，事实上，一个故事，只能表现一个时代、一种社会，而不可能同时表现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世上哪会有两件相同的事情呢？时间不同了，地点、条件不同了，它们的矛盾解决过程和思想意义也就不同了。春秋战国时的国际关系与今天不同，信陵君的军队与当时人民的关系与今天不同，他的抗秦决不会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他的援赵也不会有保卫社会主义的意义。历史既不会重复，影射也就没有逻辑上的根据。信陵救赵的故事完全可以有其历史经验本身的教育意义，并不靠它与“抗美援朝”表面上的相似而获得教育意义。影射实际上是不相信历史本身的真理，不依靠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起教育作用，而把教育作用寄托于形而上学。

过去，在蒋介石的专制淫威下面，我们许多作家在历史剧（或历史小说如《故事新编》）中间指桑骂槐，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当时的这种曲折的斗争形式，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里，我想不必涉及这种可以称为特殊的情况。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放笔直书，而不需要影射。

你在信里也談到，因为勾踐当时的措施的确有許多看来与今天相似，感觉到很难避免这些描写。依我看，这还是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和表现历史生活的問題。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考察历史，总会在与今天的表面相似中看出实质的絕對不同来，因为每一个事物，其内部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因此我以为，在写这个具体的历史題材上，既不必仅仅为了相似而躲开不写，也不必为了相似而故意去求其更似。能写出不同的矛盾的不同的本质，表面上的相似就不会产生反历史的感觉。勾踐为了复兴越国，他要不要調动群众的积极性？恐怕也是要的，沒有人民的力量参加，勾踐个人又有什么本事呢？但他調动的办法，恐怕还是自古以来統治阶级那一套强迫命令的办法，自上而下的办法，临之以威，绳之以法，或者也加一些怀柔，絕不会与人民政权的方法有任何相同。勾踐提倡勤儉，鼓励生产，都一定有那个时代，那个阶级的特点。古代帝王，都十分重視农业，他們或有亲耕的典礼，或有劝农的行动，而勾踐做得恐怕是比较认真，成效显著。勾踐是把“躬身秉耒，夫人自織”以至“臥薪尝胆”之类的举动，当作政治动员工作来做的，我們习惯于把这叫作“权术”，似乎是伪善，但我想这既是伪，又不是伪，他們是政治家，不拿它当政治工作去做倒是不对的。你信上說，总担心台上表演勾踐、文种和农民

一起鋤地，觀眾要哄堂，我看，你把這場面寫成個動員大會好了，這既決無損于勾踐的英雄形象，也表現了他們並不是真的去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這也照顧到了這些古代統治階級的人物的歷史的、階級的局限性了。有人以為，既然要描寫古代英雄人物的進步行為，從而歌頌之，使後代的我們得到鼓舞，而又要寫他的局限性，寫他的缺點，不是有損于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了嗎？我以為，局限性是貫徹于人物行為的終始，而不是在某一場表現一下。並且，局限性怎麼會是人物的缺點呢？局限性是限于歷史的具體條件，他不會怎麼想和不會怎麼做，這不是人物的缺點，這是人物的歷史規律性。對於歷史上的杰出人物的歷史功績，列寧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他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正是他的局限性，而這當然不能責怪他。這不是他的缺點。他的缺點可以有的，可是不在這裡。

在歷史劇創作中，我們完全可以表現古人的主要方面，略去他的次要方面，強調他在歷史上的功績，而不苛求其他。但即使在他的主要方面，他的功績，也是受約束于歷史所能具備的條件之內。他的功績既表現了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又表現了當時歷史條件已經允許了這樣的可能性。人的功績，就在於他排除萬難，發揮了自己

的主观力量,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勾踐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与他的能干而坚强的助手文种、范蠡等一起把战败了而又受制于吴的越国,变成新兴的、强大的越国,不但打败了骑在他头上的吴国,而且一跃为当时諸侯的盟主。这是很不简单的。他和当时全越的人民,大大发挥主观的能动精神,艰苦奋斗,终于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这种主观能动的积极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但在描写越国这种全国上下敌愾同仇的行动的时候,我想应该不要把勾踐与越国的人民混同起来,抹杀了他們的阶级差别。我看,即使在兴越抗吴这个问题上,越国统治阶级与人民是联合起来的,他們也仍然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混同了这个差别,就不能够正确地表现出那个时代同时代风貌,也不能够正确表现出那时人物的阶级性格。我們讀历史,总知道自从原始社会以后,历史上一一直是阶级社会,这是历史的基本真实,不反映这个基本真实,談得到什么历史真实性呢?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历史剧,这些历史剧都是有令人信服的阶级社会的真实描写的。人物身上,也有着令人信服的阶级的烙印。无视这种阶级矛盾的存在的结果,往往会把历史上那个社会,表现得类似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既没有了什么典型环境,也没有了有什么典型性格。有一首民歌說:“什么苗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說什么話。”

我看，在这个戏中不去写越国阶级斗争是可以的（在那几年，越国的内部矛盾恐怕确是降到从属的地位了），但统治者仍然应该写成是统治者的立场，说统治者的话，这样的语言，是有历史具体性的。观众听得出，在这语言后面，是一个古代的阶级对立的社会。不用这样的语言，观众就会迷惑起来。

你说，需要又写出勾践发愤图强，又不显得现代化，颇费躊躇。这个问题是在写历史剧时必然遇到的。越有些史迹容易混同于今天，就越要注意，越要“躊躇”。越国无疑是有着自己的阶级矛盾的，在吴国的进攻下，吴国统治阶级变成越国人民的主要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时候，吴国统治阶级与越国人民的矛盾，就超过了越国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那个时代，得胜的国家，不只是压迫了战败国的统治阶级，而且直接压迫和剥削战败国的广大人民，他们在战时要杀戮他们，在战胜后要奴役他们，要贪得无厌地掠夺他们，有的当然通过越国统治阶级的手，有的恐怕也会直接来做，以补偿他们的战争损失，增加战胜国统治阶级的财富，和炫耀自己的胜利。正是在越国的两个阶级都与吴的统治阶级有重大矛盾的情形下面，越国人民虽然不满统治阶级的某些专制淫威，但终于会支持勾践的富国强兵，旨在摆脱吴国的压迫的做法。这样做是符合越国人民的利益的。我想，勾践当然不会去作这样的形势估计和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更不会这样

來說服人民，他滿心只是为了自己的奇耻大辱，立志要再站起来。他要求全越人民积极劳动，发展生产，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这些措施，都不会是象我們今天这样发动群众，在群众自觉自願的基础上来办事，而是用那个統治阶级慣用的方式，用立法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加于(多半是强加于)人民的。但他这回可能注意了方式方法，緩和了一些人民的不滿，有些措施也照顾了人民的利益，因而推行得比較有效。这絕不意味着勾踐取消了剝削。他也可能暂时減輕一点剝削，以便于动員人民扩大再生产。但到准备与吳再战时，他还是要把建立一支军队的重大負担，轉嫁于人民的。由于人民与吳国統治阶级的矛盾更大一些，越国人民(尽管是不自觉的)还是支持了勾踐，替他生产，替他当兵，复兴了越国。勾踐采取了一些激励人民的斗志的办法，如“臥薪尝胆”，恐怕就是这些办法之一，他以最高統治者的資格，組織了生产，教育了群众，打敗了压迫者，使越国轉弱为强，这就是他的功績。勾踐这个人，是一个有毅力和有志气的人，他能吃苦耐劳，严厉地执行一件件复兴越国的步驟，用了十二年時間，使越国强大起来。他的英雄的業績就在这里。他决沒有不剝削人民的美德。他頂多是提倡儉朴，食不重味，衣不重采(这是統治阶级为緩和阶级矛盾，团结人民所必須)，以至他著名的“臥薪尝胆”的煽动性的举动，这些都井沒有离开他統治阶级的立場。把这些正确地、不

使它离开統治階級立場地加以描写，也就描画出勾踐的不同于現代的发憤图强了。

对历史人物，既不要苛求，也不要溢美，歌頌、批判都要适如其分。我們應該站在无产階級的高度去俯視他，俯視他的历史功績，看到他的本事，他的志气，他的英雄性格，看到他的措施怎样符合了当时历史发展，因而“时势造英雄”。象勾踐，这个人物还是有他那一套統治階級的世界观的，胜吳之后，难道他还会去臥薪嗎？还会去尝胆嗎？还会自己耕田，夫人織布嗎？他的統治者的一套驕奢淫佚，人莫予毒的东西，漸漸就發揮出来了。这前后两个勾踐，其实是有內在的一致性的。記得有筆記記載一个讀書人作了官，每飯非吃魚肉不飽，十分奢侈，有他讀書时一个朋友托人来提意見道：“你忘記过去吃稀粥，啃咸菜的生活了嗎？”他回答道：“你替我反問他：以前吃稀粥，啃咸菜是为甚么呀？”他的階級本质，实际是在吃稀粥和吃魚肉的两个阶段中“一以貫之”的。这故事很好，值得思索。对于剝削階級人物，在写他吃稀粥时切不要去保证他以后决不“一闊臉就变”，在他的性格中是要保留他的以后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才好。

来信还談到战争的性質問題。你說在史书中翻了一遍，无法判断吳越之間的战争，到底誰是正义的一边。因为夫差的伐越，虜勾踐，主要还是因为勾踐首先曾經打败了吳国，射伤夫差的祖父闔閭，并且伤重而死，夫差因此

立志兴吴伐越，这就很难断定他们的是非曲直。你说想在剧本中不去肯定谁是正义之师，这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处理戏剧的矛盾本来可以不拘一格，既可以处理成象《金沙灘》那样“是”的一方与“非”的一方的矛盾，也可以处理成《两將軍》那样，英雄对英雄，好汉对好汉。夫差这个人物，在阖闾被伤而死后，叫人立在自己寝門，出入的时候都厉声曰：“夫差！尔忘越人杀尔之祖乎？”夫差就肃然回答：“唯，不敢忘！”——象这样的人物，不也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物嗎？后来的因胜而驕，志气隱退，那就走向了事情的反面，从“忧劳可以兴国”走向“逸豫可以亡身”去了，正象欧阳修給后唐庄宗所作的总结那样。把他们的前后两个阶段，都如实地写出，不是很有丰富的教育意义嗎？至于勾踐，也并没有忧劳到底，他们都是半截英雄。春秋时代这一些統治阶级，彼此兼併，从春秋初期的一百六十多国吞併到战国时代的七国，占土地，掠奴隶（象隱公元年“郑伯侵陈，大获”，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鄆……尽俘以归”那样的事，左傳上的記載很多），表现了統治者之間强凌弱，众暴寡的残酷的掠夺。大国的諸侯，为了臣下索賄不遂，进了谗言，竟可以把小国的諸侯囚系三年；为了小国的王妃美貌，竟可以带兵灭亡人的国家，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强盜邏輯。于是，“爭城以战，杀人盈城，爭地以战，杀人盈野”，人民的生命成为这种暴行的代价。象商湯的伐桀，武王的伐紂那样吊民伐罪的战争，这个时代已經